



长助理王炳南回忆：“会议中间休息时，我们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没有聚在一起。周总理非常谨慎和严谨，杜勒斯又是坚决反共的头子。双方不可能握手。”回望历史，中美在20世纪50年代交好的可能根本不存在，毕竟当时双方没有什么共同利益。

此前，美国与新中国的公开接触，大抵只有朝鲜战场上美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交战，以及各方军人参加的停战谈判。甚至，1953年7月23日于板门店举行的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上，也是由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和美军哈里逊中将代表双方签字，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所谓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则分别于平壤、开城、汶山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美国真正考虑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要到20世纪60年代末。“1968年，当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我和费正清，还有一些朋友一起给尼克松团队写了一封信，建议尼克松上任以后和中国拉关系，其实就是寻求建立外交关系。”2020年12月20日去世的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在当年5月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曾回忆道。傅高义称，在60年代中后期，他发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已经不好，同时，中国对加拿大、澳大利亚、西欧的关系都增加了”。在当时的他看来，美国也应该寻找机会与中国和好。

傅高义披露，他和哈佛大学研究中国的一批人，都觉得之所以要跟中国接触，除了当时现实的国际政治格局在变化以外，更必须看到——当时的世界将中国的国际地位看低了。中国人口这么多，历史这么长，美国必须要跟中国合作才有出路。而与费正清关系不错、曾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基辛格确实听到了来自哈佛大学的一些声音。作为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任的基辛格，是完全采纳了来自哈佛学者们的建议，还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来决定如何发展对华关系？傅高义称，对此自己也不太清楚：“但基辛格到访哈佛时曾提到，早在1970年底之前，他就与周恩来建立了联系渠道。”

1971年7月8日，基辛格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出发，乘坐巴民航波音707飞机秘密来到北京。当7月9日凌晨4时30分其抵达首都机场的时候，中方只有叶剑英在机场迎候。11日，当他离开北京的时候，世界静悄悄的，似乎一切没有变化。

时隔两个多月，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这一次，在得到尼克松授意以后，他想和中方进一步谈谈。“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但美国不同意在联合国驱逐台湾当局的行动。”基辛格对中国领导人如此说。

毛泽东主席回说：“我们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我们今年都不进联合国！”



1972年2月24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等游览长城。